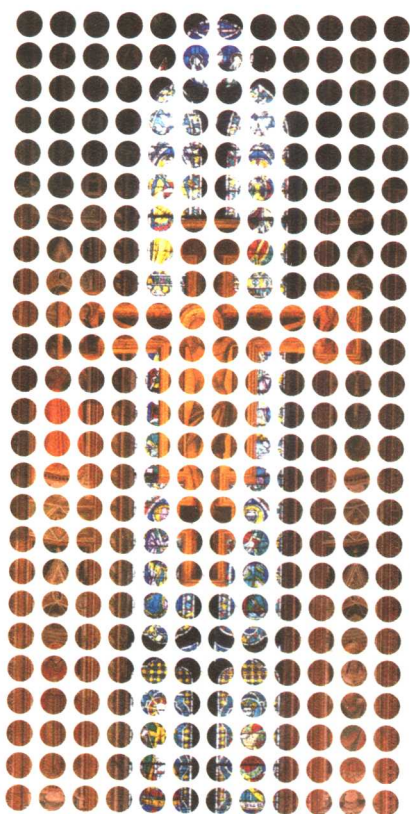


暮色中的十字架

赵林随思录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赵林 著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暮色中的十字架

赵林随思录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寒 山 孙 涵
装帧设计 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色中的十字架——赵林随思录/赵林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

(赵林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2764-9

I. 暮… II. 赵…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②史学-通俗读物
IV. B-49;K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7048 号

暮色中的十字架

MUSE ZHONG DE SHIZIJA

——赵林随思录

赵 林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75

字数:193千字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060-2764-9 定价:21.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自序 / 1

自我意识的反思 / 4

第三代诗人与第四层人生 / 14

永恒的追帆 / 24

我命运中的一个重要枢纽点 / 33

在辉煌背后

——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赛后感 / 4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赛后 / 50

徘徊于怀疑论与独断论之间 / 61

暮色中的十字架 / 73

学术生涯与心路历程 / 80

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 / 99
人类文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 118
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 134
全球化与文明冲突 / 138
重返精神家园 / 146
分裂的痛苦与神圣的虚伪
——基督教文化的“AN·AIKN” / 151
卢梭和他的“血手” / 160
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 170
中国文化启蒙的悲枪变奏曲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评介 / 178

自 序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恍恍惚惚之间，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蓦然觉得老之将至矣。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少时的盛夏之夜，躺在凉床上面对着灿烂的星空，心中意识流般的闪现着一个又一个奇思异想的情景。那时候我有许多梦想，但是却没有一个与我的现状有关。我想象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像西楚霸王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或者像牛顿那样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或者像加加林那样驾驶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探险者，唯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日日危坐书斋、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但是今天回想起来，这个结局似乎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或许正是少时耽于幻想的习惯，使我渐渐地从追问经验事物的原因转向了追问形而上学的本体，从痴迷于大自然的奥秘转向了热衷于自我意识的反思。事实上，自我意识与自然世界一样，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玄奥殿宇。一个人即使对外部世界有着深入的认识，但是如果他缺乏对自我的反思意识，仍然称不上是有智慧的。一个婴儿在咿呀学语时就会说“我”这个字，但是许多人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我”是什么。据说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有一块黑色巨石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几个大字（也有人说这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名言），苏格拉底一生中都把这句话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甚至连苏格拉底之死也与此有关。在法庭上面对着人们的指控时，苏格拉底对雅典人说道：“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

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①这段话常常回荡在我的耳边，使我不断地反躬自问，不断地反思自我，成为一种莫大的精神鞭策。

如果说科学使我们改变了自然世界，那么哲学则使我们改变了自我意识。由于外部世界是通过我们的感觉和意识而被我们所认识的，所以改变了自我意识，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本身。简单地说，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用自己的意识来思考世界。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世界就具有什么样的色彩；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世界就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偏僻山间的一条蜿蜒小溪，在一个农妇眼里就是洗衣服的地方，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则是一幅绝好的风景素材。人生中的各种遭遇——磨难、幸运乃至生存与死亡本身，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通常都留恋于肉体的快乐，贪生怕死，苏格拉底却明确地表示：“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生老病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也无法摆脱病痛之苦、生死之轮；但是从主观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对于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客观事实却有着迥然而异的感受和意识。由于我们只能活在自己的感受和意识之中，所以改变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意识，实际上也就改变了生活本身的意义。

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但是正因为它太简单了，反而难以被我们所反思，正如同离眼睛最近的东西（眼睫毛）往往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一样。使人对这些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道理进行反思，使人不仅把眼光专注于纷纭复杂的外部世界，而且也转向深邃玄奥的自我意识，这或许就是哲学的意义吧！

人生在世，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百年。我们从小所受的无神论教育，使我们坚信宇宙浩瀚无垠，时间川流不息，而人不过是广袤时空的交汇点上的一粒微小尘埃，所以，此生此世便是一切。这种人生信念使人珍惜生命，留恋现世，对于死后的事情则漠不关心，正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六合之外的事情，通常都是存而不论甚至断然否定的。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的生存态度也使人在内心深处常常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惶惑——如果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如此短暂，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它使得漫长而崇高的道德追求在当下直接的幸福享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这

^① 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节。

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又会情不自禁地希望有另外一种生存状态，这种希望对于短暂的现世生活多多少少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正是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道德追求之间的张力，使康德确立了宗教信仰的必要性。

多年以来，我的学术研究一直与基督教有关，但是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一方面，我在学术上力图说明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化的根基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长期的哲学质养又使我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精神，对于任何经验上无法验证和理论上无法证明的东西都难以信仰。尽管在我的骨子里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意识层面，我始终都是一个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事实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不仅是我一直热衷的研究课题，它同样也是我人生实践中所体验到的最深刻的矛盾。

在这部小书中，收集了多年来我对于人生经历的一些感受，以及对于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在这些随感和反思中，既记载了我在许多具体境遇中的生存体验，也反映了我对于一些文化现象的理论分析；字里行间既熔铸了炽烈的情感，也体现了冷峻的理性。它可以看作是我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把这本展现了我心路历程的小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来认识我，而是为了启发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他们自己。

赵 林

2007年1月20日于香港道风山

自我意识的反思

初秋的一个清朗静谧的夜晚，我伫立在一个古朴的小县城的尽头，面前是一片沉寂的湖水，几缕朦胧的灯光从远处黑黝黝的山麓投射到湖面，微微摇曳。丝丝凉爽的晚风迎面拂来，使我感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惬意。四周万籁俱寂，稀疏的灯光溅起了感奋的遐思。

我想起了一个遥远的夏夜，天空也是这样深邃，世界也是这样静寂，我仰面躺在一张凉床上，慈祥的外祖母坐在一旁，一面摇着蒲扇，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唱着古老的歌谣。当我快要进入梦境时，依稀听她唱道：“有一颗星星正在看着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寻找着这颗星，怀着无尽的希望，流着感伤的心泪。

我想，自从泰勒斯开始，几千年来，哲人们也一直都在寻觅着这颗星。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基督教的天国；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尽管各自的信条、途径不同，但是那种使人类灵魂超越重浊的现实、追求瑰丽的彼岸的基本倾向却是一致的。人类在希望之光的感召下艰难地匍匐前行，越过了蛮荒的莽林，越过了文明的沧桑，

把一道道斑驳的血印留在历史的废墟上，滋润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化。而饱受颠沛之苦的自我意识则站在往昔与未来的交合点上，站在现实的宽厚的胸膛上，深刻地反省着社会，反省着人生，反省着自身。

我曾是一个在人生的海滩上拾取闪光贝壳的顽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温柔之梦曾是那么的甜蜜、宁静。那时候，天空是那么湛蓝纯净，海洋是那么辽阔澄碧，我曾是那样全心全意地相信幸福，像童年时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在快乐的海洋中游泳，完全陶醉在一种宇宙一般浩淼而空幻的幸福感中。

可是一阵险恶的迷雾弥漫于广袤的天地之间，玷污了水晶一般透明的童心。于是，我和同时代的热诚而虔信的青年人一样做了噩梦，用嘶哑的声音发出魔鬼的誓语，用纤弱的双手摧残着文明的身躯，为了那些海市蜃楼般的空洞理想，把自己的本质和自我意识廉价地出卖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忏悔，泪流满面地忏悔我们的无知，控诉那个迷失了本性的时代，引诱我们堕落的蛇。1980年5月，一个署名“潘晓”的青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牵动了在迷惘中徘徊的广大青年的心，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就是在那场讨论中，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尽管那时我已经25岁，已经在大学里啃了两年多的书本了。

比起后来的那些心灵敏感、思想开放的大学生们，我算是很愚钝的了。我喜欢把他们称做“天生的无神论者”，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怀疑精神，他们的视网膜上长着一根批判的神经，因此他们从来就没有崇拜过任何神圣的殿宇。可是我却不一样，我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怀的人，一个忧郁的思乡者。当自己曾经信仰过的神殿突然坍塌以后，我常常怀着一种哀伤的失落感，一种摧心荡肠的空虚；总是想重新找到一个支撑点，以寄托那个飘忽不定的孤魂。

外部世界既然已无栖身之所，于是我转而狂热地崇拜起自我。

在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一种偏激的笔调给“潘晓”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封信不久后即被《中国青年》全文刊载，编辑从我的信中提出一段话来作为标题：“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封信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以后，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马上就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其后的几期《中国青年》和其他刊物中，连篇累牍地刊载了评论我的观点的文章。有人认为我的观点只是资产阶级早期思想的再现（于是乎我就成为一个喜剧或滑稽剧的角色了），大多数

人都批判我，给我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我的见解是深刻透彻的，甚至把我比做布鲁诺式的殉道者（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尴尬情势下，我自然很珍惜这些同情与支持，但是我绝不至于像布鲁诺那样高尚）。这件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我只是凭着一股多少有点盲目的热情投入那场讨论的，但是后来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它甚至影响到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却使我不能不理智地予以对待。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该走的路不论多么崎岖坎坷，毕竟已经走过来了，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场讨论，并反省一下自己当时的思想，倒是颇有意思的。

那场人生观大讨论与其说是理智的产物，不如说是情感的产物，它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的古典主义悲剧中的一段浪漫主义插曲。在经历了长期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年代之后，人们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迸发，它要求社会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现在看来，它其实是一场人性的启蒙运动，虽然谈不上深刻，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却是刺向浓重天幕的一道闪电，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至此，一丝清凉的气息吹进了阴晦潮湿的生存环境，吹进了人们失望颓丧的心田。将来人们也许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的价值——历史是有良心的，它会用醒目的色彩记录下每一个闪光的时刻。

然而，那个时代毕竟是用心而不是用头脑来思考问题，它流了太多真诚的眼泪，但眼泪是不会结出硕果的。当人们带着干涸的泪痕冷静地再次思考人生时，他们会发现严酷的现实生活仍然冥顽不化地矗立在他们面前，荆棘依然密布于四周，要想开拓新的伊甸园，需要更多的不是悲伤和忏悔的泪水，而是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行动。

我参加那场讨论的动机一开始就和别人不同，我是抱着建立一种新信仰的愿望投入其中的。我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心灵永远生活在彼岸世界。在气质和思想上，我与雪莱颇为相似，我老是希望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是爱与美。在我看来，一种缺乏爱与美的生活就是一座坟场。因此，当我从小就信仰的那个世界中的爱与美突然变成了恨与丑时，唯一能够维系我的生存的信念就是重新在崭新的地平线上找回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爱与美。

于是，我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发现了自我，虽然我们是殊途同归——我是从罗曼·罗兰那里发现我的新信仰的，他说：“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

当时我是何等热诚地忠实于这个新上帝啊！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每一个充分自觉了的自我都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你可以从那里发掘出无尽的宝藏。”“在体验了痛苦的生活和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个人只要清晰地意识到自我，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我就是历史。”现在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所理解的自我是很肤浅的——当然，比起那些更肤浅的把这种自我等同于狭义的自私的人们来说还是要深刻得多——自我仅仅局限于自身之中，孤傲地与客观世界对立着，而没有与它的对立面形成统一。我仅仅停留在费希特哲学的第一个阶段，自我被理解为一个终端，一个黑洞，它桀骜不驯地与外在世界对峙着，像河外星系中的一颗寒星，孤独、深邃、冷漠。它用自己的光折射着世界的形象，但是却永远不能融化于世界，不能领略那种心醉神迷的忘我境界。

那时候的自我意识还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中扬扬得意地旋转着，它把这个小天地当作广袤的世界本身，自我意识还没有超越自我。

与我以往所崇尚的那种令人醉心于其中而忘我的对象化信仰比起来，这种自我崇拜的新信仰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叛逆的异教，它以封闭的形式发展到极端，将是对客观世界的全盘否定，美与爱既然只在自我之中发展，外在的客观世界当然就变得毫无价值。社会曾经无情地凌辱了自我，于是自我转而加倍地报复社会，自我意识把脊背转向了现实人生。

此刻，宁静的湖面在晚风的轻拂下微微地漾起阵阵涟漪，我在心旷神怡的情境中回想起自己在人生观大讨论之后所经历的那一段疯狂的颓丧，不禁感到一阵战栗。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我用玩世不恭的双手把生活扒得一丝不挂。我和朋友们打赌，在风雨大作的二月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喝着酒，不厌其烦地沉浸于逢场作戏的情感游戏中。我挖空心思去寻求一切可能的刺激，时时刻刻受着一种不安的躁动的煎熬。记得有一次，我与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发生了口角，被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当我从血泊中爬起来时，恶作剧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自嘲地说道：“骄傲的鼻子依然高耸着！”然后甩头扬长而去。当世界喧嚣和骚动之时，我对着生活歇斯底里地狂笑，我嘲笑一切神圣的偶像，我为那些尚未出生的生命唱挽歌，我在噩梦的坟地中转来转去，想像拜伦一样寻找一个老修道士的头盖骨当酒杯。狄德罗曾经讽刺贝克莱，把他的感觉比做“一台发了疯的钢琴”；而那时候的我就是一台发了疯的钢琴，无休止地奏鸣着宇宙间最不和谐的声音。我把加缪的名言“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

而是生活得最多”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像金斯堡所说的那样：“让躯壳经受炼狱火烧，都为的是追求梦幻，毒品、醒着的噩梦，酒精、性，无穷的寻欢作乐。”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像忧郁的哈姆雷特一样苦苦地思索着生与死的问题，像里尔克在《秋日》中所写的：“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间小道上来回徘徊，当着落叶纷飞。”有时候我也狠狠地诅咒自己的荒唐举止，流着忏悔的眼泪暗暗发誓，要严肃地对待生活。可是，当炫目的太阳一旦升起，我的心灵和躯体又不由自主地沉溺于放荡的迷狂中。白天，我像魔鬼一样纵声大笑，夜里，我又变成了悔罪的羔羊——这种深刻的二重化和自我分裂如同蛆虫一般啮噬着我的神经。我也曾经想过结束这痛苦而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安宁的永恒。可是，年轻的生命毕竟太强大了，我终于没有离开这个后来才发现是如此美丽的世界。也许莱布尼茨的结论是对的，他说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无怪乎浮士德最终要感叹：“生活太美好了，请停留一下吧！”

可是当时我并不这样想，我以疯狂的自我去诋毁一切外在的神圣之物，只是为了保持一种乖僻的内心平衡。

按照《圣经》的说法，使徒保罗过去曾经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坏人，后来受了基督的感召，变成了最大的圣徒。可是我想，如果保罗受到的不是基督而是撒旦的感召，他可能会变成最邪恶的魔鬼。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画家准备创作一幅宗教题材的壁画，画面上的其他人物都构思好了，可是圣婴和犹大的形象却无法把握。画家到处寻找，终于有一天在街头玩耍的一群孩子中找到了一张纯洁可爱的脸，这张脸是如此的光耀照人，以至于他一下子就认定自己看到了真正的圣婴。于是，他画了这张光彩动人的脸。可是，犹大的形象仍然找不到。许多年过去了，画家两鬓染上了白霜，腰也弯曲了，他本人对寻找犹大形象的心事几乎已经失望。有一天他郁郁不乐地来到一家低级酒馆，正喝着闷酒，突然看见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酒、酒”。醉汉在画家的桌前摔倒了，画家同情地把他扶起，就在那一刹那间，画家看到一张极其邪恶的脸，这正是他寻找多年的犹大的脸！于是画家把这个再世的“犹大”带回自己的画室，对着这张脸开始临摹。画着画着，这个“犹大”突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说道：“先生，你大概万万想不到，当年你画的那个圣婴就是我这呀！……”

人是可塑的，然而可悲的是，人天生就有一种从恶心本性，对于人来

说，魔鬼的声音往往比上帝的声音更亲切。当时我的逆反心理已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常常有意识地践踏一切过去在我看来是美好的东西，从各种夸张的虐待狂的行为中寻求一种变态的心理满足。但是，良心却不时地发出几声挣扎的叹息。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情，它深深地牵动了我的良心，使我开始重新反省自我。那是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夜，我怀着把上帝耶和華凌辱一番的恶作剧心理来到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挤满了虔信天主的人们，我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跪在圣坛前的一个角落里，好奇心驱使我上前与她搭讪，小姑娘很友善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告诉我，她一家人都是天主教徒，她从小在一种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情感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她真心诚意地相信天主。当时，我除了自己心中的自我之外并不相信任何外在的权威，但是我仍然被她的虔诚感动了。她对我讲着她的上帝，不禁神采飞扬，眼中闪着点点希望之光。说着说着，她突然问我：“你信仰上帝吗？”

我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用平素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回答道：“不，我信仰魔鬼！”

小姑娘的脸蓦的变得苍白，两只茫然的大眼睛惊惶不安地盯着我，我发现这双刚才还是晶莹透澈的眸子此刻却被伤心和恐惧的泪水弄得模糊了。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像一只受人伤害的小羊，眼光里流露出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委屈。我突然感到一种彻心透骨的自责，一种深沉的负罪感，我不敢再面对她那充满疑虑的眼光，匆匆地跑出了教堂……

我本想捉弄一下被人们供奉在圣坛上的耶和華，可是我却伤害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的诚挚的心。我不知道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遇见她了，但是她那双饱含怨意的忧伤的眼睛却永远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我的心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颓丧是有些过头了，但我始终不认为那就是堕落。对于一颗年轻的心灵，仅仅有天堂的玫瑰花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点地狱的硫磺之火。当我用心灵聆听着上帝的声音时，不妨也让身体感受一下魔鬼的诱惑，这样将会使自我更加深刻和丰富。我的那些荒唐举止绝不是一种肤浅的享受主义的结果，我的一位朋友曾把我的行为称为“严肃的玩世不恭”。我倒宁愿引用勃兰兑斯评价拜伦的放浪形骸时所说的一段话来为自己辩护：“拜伦和他的朋友们怀着年轻人公然反抗和厌恶一切陈旧礼俗的情绪，过着一种放荡的、不时表现出执意要惊世骇俗的别出心裁的

生活，而天才人物，正如历史所显示的，在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当的使命和目标以前，往往都会沉溺于这类别出心裁的癖好。”“拜伦如此放荡形骸，并非由于他过分兴高采烈。事实上，他像大多数才能出众但尚未有机会一显身手的青年那样，由于面临着无穷尽的人生疑问而经常感到悲从中来；不仅如此，他还由于自己火热的性格和出身教养而整日郁郁寡欢。”

我的那些放荡不羁的行为都是由于片面发展的自我意识而导致的。实际上，当我做出各种荒诞举动时，心中常常在思考着如何解救陷入困境的自我，那时就已包含着超越自我、重返外部世界的无意识冲动。现在看来，那种深刻的颓废是很有意义的，它以否定的形式拓广了自我，丰富了我，使自我包含了对立面，并且为自我的超越奠定了基础。我曾在一篇论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文章中这样描述现代人分裂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在20世纪这样的反传统英雄的时代里，一代精英并不像圣母玛利亚那样具有一尘不染的纯洁。20世纪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孕育着内在的矛盾和烦恼、遭受着宇宙一般广袤的痛苦和不可躲避的困窘折磨的不屈不挠的主体。它是一个新的苦难十字架，但是隐蔽在这个痛苦十字架背后的不再是情态暧昧的上帝，而是勇敢、严肃地选择着存在状态并且自觉地为此而承担责任的自我意识。这个形象具有对立统一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体验着深刻的自我异化，一方面又执著地追求着异化的扬弃。表面上，它放荡不羁、玩世不恭，肆无忌惮地睥睨和嘲笑着文明的帕特农神庙（古希腊雅典最大的神庙）中一切闪光的偶像。它具有一种充满哲理性的幽默感，把颓废和荒诞的面具分别贴在自己的左右颊上，极力在一本正经而又伪善的现实社会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实质上，它始终不渝地向往着一种超越的彼岸，它的崇高理想是在坍塌的文化废墟上建造一个新文明的乐园。它的幽默是一种含泪的幽默，它的空虚是一种充实的空虚。在颓废和荒诞的外表之下，经过深刻反省的自我意识时刻都在积极地呼唤着新生的希望。”

这番描述也可以看做是对当时的我的一个剖白。

当然，自我是不会永远滞留于那种疯狂状态中的。那疯狂的状态就如同吗啡，可以暂时刺激一下人的神经，使人兴奋振作。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则会耗尽人的精力，使人在萎靡之中慢慢死去。

有一次我读到一位作家关于雪莱之死的一段描写，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雪莱）最后一次从莱杭泛海返回勒瑞奇，突然遭遇夺去了他的生命的风暴，他那陷入绝望的妻子在沙滩上寻找了好几个

漫长的日夜，终于发现他那具几乎难以辨认的尸体。托斯卡纳当地的法律规定，任何海上飘来的物体都必须付之一炬。于是，雪莱的遗体就由拜伦和特列劳尼安排火化。他们举行了符合他性格的希腊式非基督教仪式：把乳香、酒、食盐和油倾洒在柴火堆上。那一天晴空万里，风光明媚，面前是安详的海，背后是亚平宁山。一只麻鹞围着火堆盘旋，几经驱赶都不愿离去。火焰升得很高，发出耀眼的金光。遗体终于焚化，但令人惊奇的是，那颗心脏却完整无损。

我很难确切地说是什么经历使我摆脱了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开始重新相信生活。但我可以肯定，这是由于对自己心中尚未泯灭的良知的重新发现，而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那种幼稚般纯真的希望。我无法具体描述这种希望，但是它所导致的那种空灵的意境，那种令人心醉的颤抖，却引导我的心挣脱狭隘的自我，融化于广袤的自然和社会之中。这是一场明净的炼狱之火，它焚化了长期积郁在心中的各种怨恨、惆怅和迷惘，使自我意识超越了自我，达到新生的涅槃。

我记得雨果笔下的爱斯梅拉达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曾感叹道：“生活多美好啊！”而活着的人们却很少意识到生活的美好。造物主似乎是个喜欢搞恶作剧的家伙，他常常使活人厌倦生活，而只对临终的人才揭开生活真谛的帷幕，让他们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瞥见人生绚丽的色彩，使他们猛醒、悔恨、懊恼，带着深切的遗憾和希望辞别人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超前地体验死亡时的这种遗憾，从而超越死亡，使生命消融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希望之中。

雪莱、雨果、罗曼·罗兰、高尔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作家，谁不对生活抱有执著的希望？即使是茨威格、海明威这些自杀身死的文学巨匠，也只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一旦发现生活中还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并非他们的希望所能化解，感伤之下才愤然辞世的。毋庸置疑，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失望恰恰能够激起希望，这种希望给予我们以生存的勇气，使我们敢于坦然地直面人生中的悲剧，直面各种灾难和痛苦。这种对于自身和人类命运的深切的希望，曾经造就了苏格拉底、卢梭、马克思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善良的人们，尽管他们没有通过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但是他们也和那些伟大的英雄们一样怀着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深切希望和纯真爱情，一样领略过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希望之陶醉和爱

情之安恬。一个人，无论是否做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他都曾满怀希望地拥抱着生活，都曾在一种理想或信仰的状态中感受过那种透心彻骨的幸福。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那么他的天国一定会向所有曾经希望过和感动过的灵魂敞开。

近些年来，我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兴趣，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背景——特别是价值系统——和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态度。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观察和思考的结论是，由于人们曾经共同信仰过的那个客观的上帝已经死去——诚如尼采所说——从这种信仰中所导出的世界的绝对性、完善性和决定论等特征也不复存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相对的、不完善的和非决定论的多元化世界。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表述的一个假言判断那样：“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事实上，20 世纪的生活方式已经无可争议地表现出它们的五光十色和多元化特征，各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就像自由市场上的货物一样琳琅满目，它们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一般性地评价哪一种好哪一种坏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在这个纷纭芜杂的生存环境中，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处世态度？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选择本身既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又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既象征着一个人的尊严，又凝聚着一个人的痛苦。与以往的那个受决定论支配的一元化世界相比（在那个世界中人们根本就无需也无权进行选择），选择使每个人都拥有像上帝一样的自由，同时也使每个人都背起了对自己和对社会承担责任的沉重十字架。从根本上来说，尽管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化的生存背景，可是我们每个人却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态度，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的最深刻根源。悲剧固然是令人失望的，然而每个人都可陶醉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用自己完满的有限去超越生存的不完满的无限。我们每个人都在表演着悲剧，但我们的生存态度却并不一定是悲剧性的。在现代社会，人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生存哲学或生存态度相关。我绝不讳言生活中充满了瑕疵，我也知道生存本身究其根本来说是悲剧性的（仅仅从人都有一死这个最简单的事实中就可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既然我们已经被抛入到生存的涡流之中，就应该充满希望地对待生存。以一种明智豁达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悲剧，我们就可以超越悲剧而进入一种灵性的安谧。只有在这种充溢的希望之中，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自我才能超越自身而实现对象化，在短暂的存在中获得永恒。因此，纵然前面